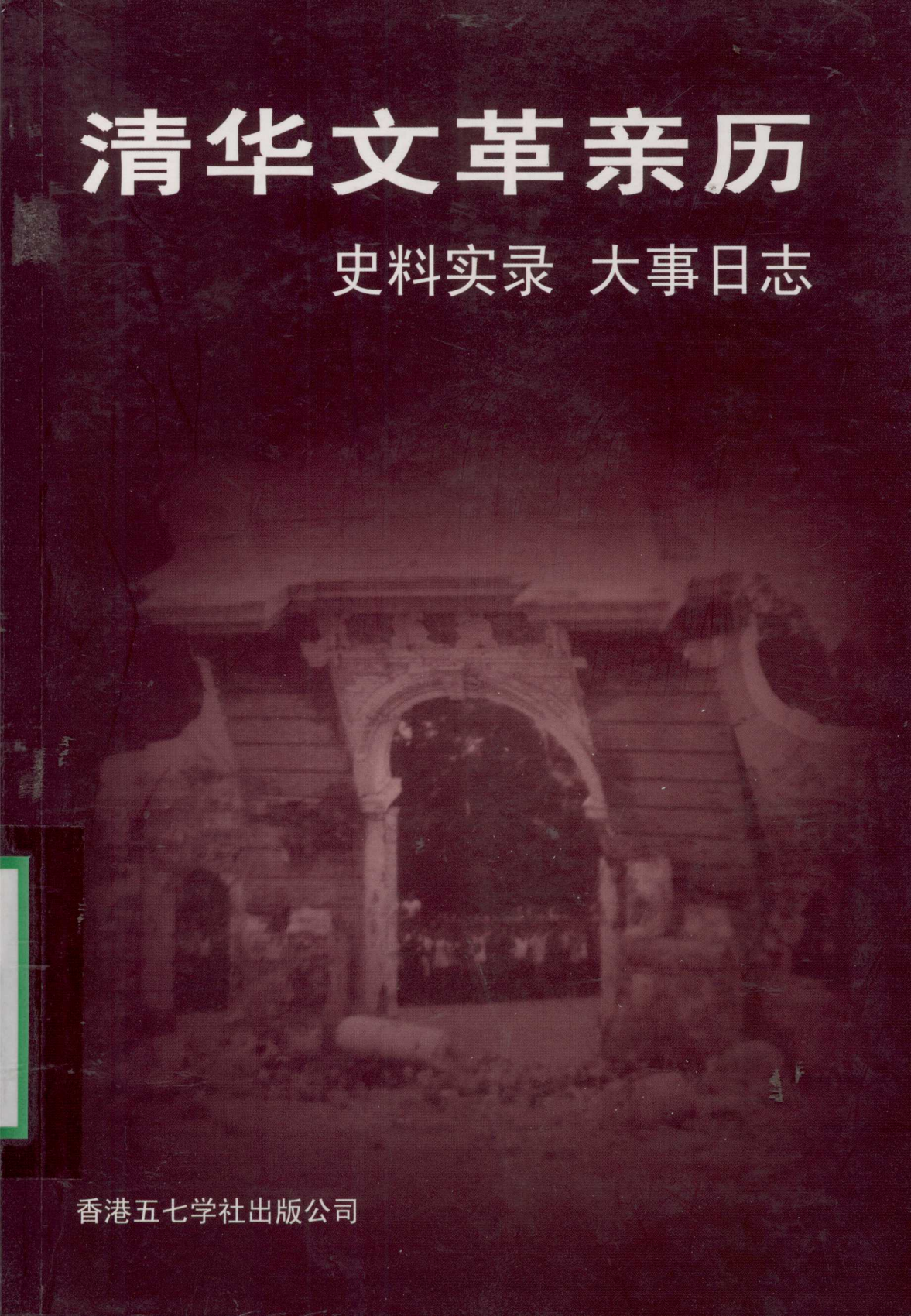


# 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清华文革亲历

#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主编：邱心伟 原蜀育

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收录 大事日志》

---

主 编： 邱心伟 原蜀育  
策 划： 齐凡思  
发 行 人： 武宜三  
封面设计： 邹立峰  
出 版： 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地 址： 香港元朗派递局 170 邮箱  
电 话： 852 - 95733657  
电子信箱： wuys088@gmail. com  
国际书号： 978 - 988 - 17894 - 5 - 7  
定 价： 78 港元

EnglishTitle: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A Journal of the Major Events**

Editor in Chief: Qiu xinwei Yuan shuyu  
Published by: 57 Publish Company HK  
Address: GPO Box170, Yuen Long Delivery Office, HongKong  
ISBN: 978 - 988 - 17894 - 5 - 7  
Price: HK \$ 78

开本： 16  
印张： 27  
字数： 35 万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编者的话

本书内容包括 1966 年到 1968 年清华大学文革前期的大事日记和相关史料。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小报”、“大字报选编”、“动态”，战斗小组自编的《大事记》、有些个人的日记和“交待回忆”。此外，我们也采用了香港中文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文革资料库》中与清华有关的部分资料，以及一些清华校友如唐少杰、沈如槐等公开出版的文章内容。本书所收录的资料目录，详见后面清单。我们已将原始资料扫描留存，以备查核。

我们收集的资料来源真实可靠，所述的内容大多真实，但也有一些由于当时派性使然，对事件的描述有失准确或有所扭曲。本书只对原始资料进行汇编和整合，不改编文字，也不考证内容的真实性。因为它们毕竟是当年清华园里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证，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可作参考。把一些派性痕迹浓重的原文组合在一起，难免出现上下行文欠连贯、语言风格不统一的现象。为保持资料的“原生态”和“真实”，我们尽量保留原语句风格，不加修饰，顶多删掉一些太多、太罗嗦的文革字眼，比如：叫嚣、恶毒攻击、污蔑、可耻行径、竟然造谣、幸灾乐祸，等等。

原始资料中，涉及一些清华的干部、教师和学生的真实人名，我们大部分把它们原封不动地登出来了。这也许是让有的人深感忌讳的事，可是为了保持史料的原始原貌和真实性，我们别无选择。这些原始资料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记录，谁也无法垄断，我们今天不用，今后的研究者也会使用。现在，绝大多数当事人都还健在，如有发现书中所录与他当时的所言所为有所不符，正可有机会写文章更正，避免以后的研究者单凭原始资料来推断是非。本书的出版，对大多当事人来说，也许还是一件好事。

本书中所收录的资料，记述的大多是清华文革中的一些公开活动。至于当时各派组织的幕后活动，少数头头与中央上层的联系，以及清华对外地文

革的介入等，基本没有涉及。研究清华文革，单凭本书这些内容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许多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已经纷纷开始写文章反思这段难忘的历史，我们希望这本大事日志能够起到提供回忆线索的作用。也希望有更多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校友，提供线索，奉献资料，特别是本书涉及的当事人能费心补充、修改、纠正，以便有机会再版时使之更加全面、完善，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 【感谢】

本书的完成，得到许多校友的帮助。他们或出资赞助、或参加讨论策划、或贡献资料、或帮助校核文字、或扫描复印及打印资料……，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按字母排序）

包薇、但榮、丁正明、甘乃元、何宇平、胡耀明、胡逢淦、胡辛莲、黄文梅、蒋雪青、罗征启、谭昌龄、王允方、颜慧中、叶志江、于火、张蔼玲、郑洪如、周宏余等。

编者联系邮箱：[qhwwgql@163.com](mailto:qhwwgql@163.com)

## 亲历者的责任

——读《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有感

马雨农

### (一)

十年文革，被称之为当代中国的一场“内乱”，一场“浩劫”。它是共和国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它所造成的灾难，实在难以估量。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盛行，封建主义泛滥，国家法制废置，人性道德泯灭，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文化教育备受摧残，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历数往事，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首！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然过去30多年了，它留下的后遗症时至今日仍有隐现，其对中国社会文化、道德精神的伤害，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研究文革的历史，记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的影响，这是当代国人尤其是所有亲历者的历史责任，也是真正“彻底否定文革”、保证中国不再有文革式“折腾”的一件要事。

巴金先生劫后复出，曾痛定思痛，多次提出：“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为此，他一再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全国人民正视这段历史，永远记取惨痛教训，防止恶梦重来。可惜，他老人家的善意良言一直未受足够重视，回首文革依然还是敏感的话题，文革研究至今仍有不少禁忌。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当时无奈的表白，如今成了至理名言。文革的历史，毕竟还需由人民来书写，只能由人民来写。多年来，中国民间的文革研究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报刊上记述、研究文革历史的文章，时有所见；一些专著出版物每年也都有问世；更有一些有心人，倾注财力，办起了私人文革博物馆。就连与文革历史相关的一些物品，也都成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热门藏品、研究课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效应。

在此潮流中，曾经在文革“风口浪尖”上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清华人，又重现了活跃的身影。一些校友相继出版了个人回忆录和研究论著，这些亲历者的回忆，都弥足珍贵。而由邱心伟、原蜀育两位校友历时多年收集素材、

## 史料实录

几经整合编辑出版的这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以下简称《大事日志》），更是一部难得的资料汇编，填补了有关清华文革史籍的空白，为深入进行清华文革史乃至整个中国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和邱心伟虽不同系，却是同届，毕业分配在一个单位，曾共事过4年多时间。为筹划出版本书，她曾与我联系过几次，可惜我因为还有不少事务缠身，没有能帮上她的忙。但我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曾建议她分步走，先汇集资料，出个内部征求意见稿就行了。没想到她和原蜀育两人这么快就完成了这项庞大的工程，足见他们的能量之大，劲头之足，责任心之强！这中间究竟经历了多少辛苦，旁人并不知道。但翻看她给我传来的稿样中所标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引文，就可以想见，他们从一份份史料的收集、核对，到按日期摘录、组合，汇编成书，再从第1稿直到第12稿的反复补充和修改，实在做了极为艰巨而繁琐的工作。他们默默无闻，尽心尽责，为清华的校史建设增添了砖瓦。他们乐于奉献，甘做铺路石，为广大读者了解、研究清华的文革史，提供了便利。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推动文革史料的收集，促进文革历史的研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 （二）

我们这代人，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在清华园这个特殊的“角斗场”，亲身经历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种种磨难，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如今年逾花甲，回首往事，这段经历，也算是一笔财富。确实应该有所作为，为反思这段历史尽到一份责任。记录历史，留存于后世，可作镜鉴。它们不只是个人的命运际遇，也是十年文革这段重要历史的民间记忆，有助于丰富文革的历史细节。恩格斯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更大进步，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得更快。”有感于此，我们更珍视这本《大事日志》所体现的特殊价值以及它给人留下的宝贵启示。

《大事日志》收集了清华从1966年4月到1969年1月文革初期将近3年时间的丰富史料，汇编了从批判“三家村”，到文革运动全面爆发，校党委垮台，工作组进校而又被撤走，红卫兵“横空出世”，两大派论战，直到“百日武斗”、工宣队进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全程记录。在学校保留的档案资料，如今尚不开放的情况下，这本民间汇编的《大事日志》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工

具书，能给读者了解、研究清华文革史提供极为珍贵的帮助。

说其珍贵，最主要的是真实，是完完全全的“史料直录”。不像有些史书，史料经过转述、过滤，甚至刻意取舍，原本的事实已走了样。这里呈现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史料，录自当年各派文革组织编印的“小报”、“动态简报”等原始材料，有的还录自个人所写的各类文字材料，包括迫于形势在强权威迫下违心写下的材料。这些史料，留有当年特定的政治痕迹和语境，是构成清华文革历史不可或缺的事证。这样客观采集，不作修饰，按时间顺序编列出来，有助于多侧面较完整地还原清华文革历史的发展过程，真实地展示这段历史的原貌。稍感缺憾的是，编者没有分别标明每段引文的出处，以使读者可以分辨某个史料的具体来源，便于研究者进一步查找第一手史料。如能这样苛求，可能会更好。

要做到这样还原真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从书中看到，涉及一些人物的姓名、称谓，包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等，编者大多原样保留了。这是今天出版这类书籍最为棘手的问题，很多出版物出于种种顾虑，往往都是隐去其名。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一些历史事件看起来变得模糊不清，有损于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周恩来曾说：“只有忠于真实，才能忠于真理”。既然作为史料汇编出版，只要确保事实没有错误，如实披露，应是最佳的选择。本书的编者是这样做的。我由衷地钦佩编者敢于说真话、讲真实、求真理的勇气，珍视这本书不同寻常的参考价值。文革结束已30多年了，现在大多亲历者也会以平常之心来看待当年的事情；相信读者有足够的智慧和辨别能力，能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

### (三)

清华的文革历史，确有代表性，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堪称研究文革历史的典型样本。其典型性就在于，清华文革的重大事件，都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与中央上层的斗争有着直接关联。毛泽东与刘少奇，所谓“两个司令部”的主要领袖，都直接插手了清华的运动，精心培育了他们的“试点”。《大事日志》虽然较少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但仍能看到相关的脉络。刘少奇委派其夫人王光美直接指导了清华的文革工作组；毛泽东则直接支持了清华附中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激励和引导青年学生举起“革命造反”的旗帜，走上文革的历史舞台，同时又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的运动

(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毛泽东身边中央警卫团和中央办公厅的迟群、谢静宜直接出任了清华党委的负责人)。对照其他文革史籍、专著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探寻到上下左右的联系，从文革大政治背景下清华的特殊视角，解析清华与中央高层台前幕后的源流互动，研判文革一些重大事件的由来始末、内外成因，加深感悟与思考。

回首清华的文革历史，犹如乱世闹剧，痛感荒唐。特别是两派势不两立的持续争斗，直至百日武斗、血腥厮杀，十多人死于非命，真是一幕悲剧。如今反思，我们无需再纠缠于我是你非的个人恩怨。对于大多数当时的清华学子来说，都是受运动的群众，虚耗了青春。热潮退后，随着一些内幕的披露不难发现，为发动文革而高举的“反修防修”旗帜后面，并非全然都是路线、道路的理论之争，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天真的想象。当年时兴一切都“突出政治”，但那时候我们究竟懂得多少政治？作为身处基层的普通亲历者，今天我们需要自我反省，总结各自的教训，但更需要的是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来反思这段历史，关注和深思相对宏观层面的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为什么会有狂热的造神运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知的盲从？它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些当时看来理所当然、绝对正确的事情，现在看来何以滑稽可笑？一些当时认为极端错误、批倒批臭的东西，今天何以又发现不乏真谛？这种人为“折腾”的教训，或许更是我们值得深刻反思的。文革中被摧毁的清华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文革后已恢复重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要真正吸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发生的土壤，就极不容易了。

1986年8月，杨尚昆曾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之约，专门就张闻天与毛泽东的话题，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他说：“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上海会

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引文见《杨尚昆 1986 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炎黄春秋》2009 年第 3 期第 36 页）

杨尚昆说“‘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可能是实情，也可能是碍于他的身份不便于明说。但我相信他介绍的有关毛泽东的情况是真实的。这些史料，对于理解文革发生发展的由来、反思文革的教训是很有助益的。杨尚昆文革前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文革前夕被贬，又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头子，文革后复出，后来曾荣任国家主席。像他这样身居核心高位的领导人尚且对文革还有“很多问题”“想不通”，可见研究文革历史是何等艰难！

文革留下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太多太多。考察这段历史，有研究不尽的课题。我有时在想，一部《红楼梦》小说，引发建立了一门“红学”，多少年来，有那么多学者在持续不断地解读、研究；对十年文革这样一段影响国家进程的刻骨铭心的历史，难道不该多一点回忆、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研究，乃至建立一门学科吗？发此奇想，并非乐于回顾，而是希望更好地前瞻，希望不再有文革式的“折腾”，诚如巴金先生所言，真正“做未来的主人”。而要有此作为，首先急需的是抢救史料，这是最为基础的重要工作。感谢《大事日志》的两位编者，以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又以他们自身的表率行为，激发起更多亲历者的共鸣与响应。希望能见到更多《大事日志》这样的书籍问世。

2009 年 4 月 5 日

于杭州

## 我的感言

陈育延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出版了，这是一本看似简单，实际却要耗费大量精力来编辑的书。使我感动的是，编者以他们的极大毅力，不分昼夜地编辑，这个过程感染了我。当电子版的初稿传给我时，促使我真正地进入了回忆。我周围有不少朋友希望我将自己所经历的“清华往事”写成回忆录，而这本书则激发了我重新翻阅自己的日记、笔记、照片和信件，觉得自己确实有责任将回忆录写出来，也愿意向他们提供我所保存的历史素材，尽量完善这本《大事日志》。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讲，当初我们都还是满腔革命热情地参加运动，那时毕竟只有20岁左右，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我们艰难地走过了“文化大革命”。到今天退休以后，“回首往事”，仍然觉得我们不该像许多文艺作品中那样被妖魔化。虽然我们犯过无数次的错误，也遭受过不少打击，但我们这一代的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党，并且有不少人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过去所知道的，和我们现在心里所想的，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站出来说和写，这一点没有人能代替我们，也没有人能帮我们证明的。

清华大学不乏聪慧的人，文化革命中清华的大字报及《井冈山》报等各种小报的文章水平，一点儿也不逊色于那些最好的文科大学，其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他们。因此我认为，只要大家都将点滴真实经历写出来，哪怕在网上发表，至少对“文化革命”的研究者来说，是会有参考价值的，对我们下一代的成长也会有很大益处的。的确，再现历史真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这是我对这篇《大事日志》的一点感悟。

二〇〇九年三月

## 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

唐 伟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后面简称为《大事日志》）付梓出版了，编者几乎全凭个人的力量完成了资料收集、筛选和编纂工作。他们为母校、为社会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大事。

《大事日志》记录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两年多时间，发生在清华大学里的众多事件，可以弥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清华大学九十年》中，对十年文革记载的许多遗漏和失实。

最早回忆清华文革的书，当数刘冰的《风雨岁月》，最早进行文革学术研究的是唐少杰。随后沈如槐出版了《清华文化大革命纪实·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周泉纁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孙维藩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他们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并展示了各自视线内所闻所见的清华文革。本书编辑的《大事日志》逐日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采集了当时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既不垄断真相，也不粉饰恶行，史料价值不容低估。

### \* 关于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分期

陆小宝校友曾将清华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工作组进校到八月中旬工作组撤离学校；

第二个时期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

第三个时期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

在工作组进校前约一个月的时间，是清华党委领导师生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小宝的划分是准确的有利于看清运动的发展和走向。

### \* 关于清华的学生领袖

清华没有学生领袖，只有派头头。

刘涛、贺鹏飞是最早贴蒋南翔大字报的人，他们是工作组指定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小组”的头头。“八八串联会”出现后第二天，他们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八月十九日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八九派的头头除刘涛、贺鹏飞外，还应包括刘菊芬、李黎风、袁塞风等人，他们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八二四”事件是这个组织销声匿迹之前最后的一次疯狂大行动。

“八八串联会”（后面简称“八八”）的头头是唐伟、陈育延、吴栋。八八是清华园里第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团体，主要任务是组织同学和工作组、临时筹委会辩论，辩论题目是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各系自发组织有分会，八八的头头人数在几天内发展到了八、九个人，包括了陈楚三、刘万章、陈继芳等人。头头们只起联络和与“临筹”沟通的作用。八月廿二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也大致是这些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廿四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发起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三总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合并。蒯大富派人抢占了“八八”控制的校广播站，二十一日单方面公布了20个总部《筹委会》名单。三天后唐伟、朱德明、许胜利公开宣布退出井冈山红卫兵总部。联合的同时发生了分裂，出现了三个“纵队”和“28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四一四串联会”成立，五月二十九日四一四总部成立，总部委员有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刘万章、王永县、周泉纓、宿长忠等人。原拟五月三十日两派大联合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由于四一四的抵制和周恩来总理临时不到场而流产。

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清华师生陆续外出串联，六八年百日武斗时在校参加运动的两派人员不到师生员工的10%。蒯大富是钦点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但实际上他在清华也只是一个派头头。汲鹏曾对蒯大富说：“你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就是在全国普及了一个“蒯”字。”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是地质学院的周永璋和清华唐伟策划成立的。“一司”是干部子弟成立的，政治观点并不

一致。“一司”漏掉的一些干部子弟，与地院、清华等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二司”。唐伟、周永璋没有参加“二司”，而是联络了一些院校反工作组的红卫兵成立了“三司”。中央办公厅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座大殿里。三司总指挥由地院派人担任，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人任副总指挥。工化系教师唐晋出任了副总指挥，后由陈育延接任。蒯大富是六六年底三总部大联合前夕进入三司的，“蒯司令”的叫法也是从那时自校外开始的。

### \* 关于清华的恶性事件

工作组时期的“反蒯”，大致历时五十天，抓了500个右派学生，逼死了3条人命。

“八一九”附中红卫兵冲击大礼堂辩论会，到“八二四”抄家、打人、砸二校门。清华园中第一次听到毒打人的惨叫，有的干部、教师被打得浑身是血，还要去清理砸毁的二校门的石块。吴德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这些都是蒯大富干的，其实是刘菊芬、贺鹏飞等“八九”成员纠集了外校红卫兵干的。多年以后刘菊芬说：“不要再提那件事了，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所谓“智擒王光美”和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陪斗的领导干部包括蒋南翔等数十人。尽管后面这次大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但仍是两起恶性事件。

“百日武斗”以及期间发生的“抬尸游行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蒯大富抢来徐向前的保险柜；私自扣押刘志坚等等。

“七·二七”打死、打伤工宣队、军宣队成员。

特别应当指出的，迟群、谢静宜把持清华的八年中，清华师生非正常死亡人数是最多的。如工化系四个主要系级领导中，总支副书记黄志冲、副系主任李文才两人都是在“清队”中被逼自杀身亡。七〇年开始的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有意安排清华教师干部在血吸虫病区“斗私批修”，使数百教师染上了血吸虫病，其罪行胜于武斗。

### \* 关于伸向清华的“黑手”

过问和到过清华的中央领导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王任重、康生、江青、薄一波、谢富治等人。

干部子弟活跃时期有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掌控清华，他们的后台显而易见。我和沈如槐都有一个《光明日报》的记者朋友，他们都是中央联络员。到一九六七年初，我还有周总理秘书孙岳的电话，紧急事情可以与孙岳通话。多年后我曾问过陈楚三：“四一四肯定没有后台，如果真有，就是你陈楚三有。到底有没有？”可惜陈楚三没有回答我问题。

在工作组“反崩”的日子里，关锋、戚本禹曾到新斋（崩大富的宿舍）看过崩大富。二十多年后崩大富应聘到山东蓬莱乡镇企业工作，戚本禹（现改戚文）不落款寄信给崩，开头即说：“我是除毛泽东外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崩收到信后即去上海看望戚本禹。

六六年七月廿九、三十日两个晚上，周恩来在甲所召见崩大富，第二次见面，周总理与崩大富谈了一个通宵。和崩大富来往最密切的当数谢富治，老崩提到他时，常常自豪地说：“我和谢富治特哥们儿。”江青多次来过清华，老崩这样描述江青的头发：“外边传言江青戴假发套，其实江青同志一头秀发。”情深意长，溢于言表。

林彪与清华相关的事有两件。一是四一四选了一段林彪语录，配上杀气腾腾的音乐，成了《四一四战歌》，也叫“完蛋歌”。谢富治看后说，林彪同志绝不会说这种流氓语言，于是陈楚三被指认伪造林副主席语录被抓进了班房。后经查证，确是林彪语录，才将陈楚三放了出来。二是二校门被毁以后，井冈山红卫兵在原址建了一个毛主席塑像。崩大富拟稿后，请林彪书写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手迹就刻在了这座塑像的基座上。

崩大富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一九七零年被召回学校接受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随同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审判，判刑十七年，服刑期从一九七零年起算。我曾两次询问崩大富：“你被隔离审查时毛主席还未过世，江青等人正得势，你就这样被抛弃了，你就没有一点怨恨之心？”每次他都作思索状，没有回答。

去年韩爱晶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其中写道：“告别时，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崩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崩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我曾向几个团派核心人物求证，他们都说崩大富当年传达时并没有这些话。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工宣队进校后，清华武斗中的团派落荒而逃，

若有“一句顶万句”的救命稻草，蒯大富还会不会充分利用？我也曾当面询问蒯大富，蒯仍作沉思状不置可否。可见韩爱晶的说法，可信度不高。如这类大事，有待知情者补充。

毛泽东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说过：“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中央领导和几乎全国军民都在紧跟，清华文革也在他的御林军 8341 部队的掌控之中，我们没有理由将伟人的坦陈，看成是伟大的谦虚。

### \* 关于陆小宝和他的《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在《孙维藩日记》那本书中，陆小宝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获得众多校友的好评。这本《大事日志》中，陆小宝又写了一篇《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陆小宝的文笔好，思考到位，文章耐看，我为他不断提升的认识而折服。文革中，小宝只是汲鹏《轮机兵》战斗组中一个怪论不休、特立独行的小角色，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他都只是一位观众，但他却始终保有乡村孩子的纯真朴诚和一个诗人的火焰般热情。工科院校的专业训练，让小宝拥有了强大的数理逻辑能力。因此，他的文章展现了一种可贵的风骨，这种风骨就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清华精神。

七〇年，小宝被分配到青海西宁钢厂轧钢车间做翻叉工，住在该厂肮脏的“洗煤楼”里。我曾在钢花四溅、尘土飞扬的车间里见到小宝。他身着帆布工装，戴着石棉帽子和手套，手持钢叉，在高温的灼烤下汗流满面。只有他的单薄身架和高度近视眼镜在提醒我：站在我面前的小宝其实还是一个地道的江南文人。

我为什么如此推崇小宝呢？因为他的文章代表了我们这一代文革亲历者的认识高度。

文化革命中，许多头头都是中共预备党员。沈如槐、汲鹏、陈育延、吴栋、陈楚三、陈继芳、唐伟、刘涛、刘菊芬……党吹响了冲锋号，这些人一马当先，也是必然的选择。我曾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毛泽东当年

确说过：“蒯大富可以当清华校长嘛。”谁知蒯大富现今的表白更凄惨：“我是想当奴隶而不可得呀！”

事实上，派头头们不仅在劫难逃，还牵连了这些人的父母。我、楚三、吴栋都是烈士子弟，陈育延，汲鹏都是干部子弟，父母给了我们反对“血统论”的盾牌，但也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因为“血统论”根子不在谭立夫，在上面、在历史的深处。刘邦当年说过：“非刘氏而王者，诛。”所以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中就没有说过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对了的人。

我们是幸运的，多少惊涛骇浪后还继续快乐地活着。人生的时光原来可以这样度过：一生的境遇要为青春买单；一生的命运叫做“自我救赎”。自控系研究生和统，武斗时路过学校被抓、被打。毕业后报国无门，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最终在美国安了家，皈依了基督教。每见他餐前虔诚地祈祷，我的心中也会说：“和统，阿门！”

我们在认识社会的丑恶、政治斗争的污秽时，也应当勇于承认自己的顽劣，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培养善待人生的悲悯情怀，在拷问历史的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这本《大事日志》是一条导火索，点燃的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大学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大学生活对人生很重要，对培养健全的人格尤为重要。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真理的获得是幸福的最大源泉之一，而真理的基点就是真相。感谢邱心伟、原蜀育的辛勤劳作，也钦佩他们数十年来从不褪色的那份真诚！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

于深圳